

#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 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周术槐

**内容提要**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是导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以缓解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

**关键词** 贵州省赈济会 难民救济 难民组训 难民贷款

抗日战争时期,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面世。在这些成果中,有从国民政府救济行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从区域性角度进行研究的。其中,涉及到区域性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滕兰花的《抗日战争时期广西难民救济工作试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郑龙昌、刘思华的《抗战期间宜昌求助难民难童记》(《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8期)、孙艳魁的《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张根福的《抗战初期世界红卍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赵燕的《抗战时期河南的难民问题与难民救济》(华中师范大学2007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周蕴蓉的《抗战时期广东的灾况和社会救济》(暨南大学2004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谭刚的《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赵红绢的《抗战时期四川难民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9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等。从这些区域性研究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成果来看,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四川与重庆。对于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虽然秦坤的《贵州抗战损失初探》(《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一文对抗战时期贵州的难民救济问题有所涉及,但其侧重点在于分析因抗战而给贵州所带来的损失,至于贵州的难民救济问题,尤其是作为贵州省官方救济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则鲜少涉及。面对此一状况,本文选取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时期贵州难

民救济活动尚无专题研究的不足。

## 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在难民救济工作中战略地位的提升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无异于一场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迫于战争的压力,为了生存的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华北和东部战争区域迁移到西部乃至西南内陆地区。由此而形成的巨大难民潮,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目前,各机构与学术界关于难民迁移的数量存有各种不同的估测。有的说,难民迁移数量达3000万以上,有的则说超过8000万。但作为政府机构来讲,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统计:从1938年4月到1944年12月底止,各救济区救济难民人数为8847208人;各省市赈济会救济难民人数为10716154人;各慈善机关救济难民人数为30151531人;三项总计为49014892人。<sup>①</sup>这一数字虽然也只能是一个大概数字,但它却反映出国民政府与各地慈善机构救济难民的基本概况。

国民政府为解决巨大的难民潮,从组织机构的设立到具体措施的落实,都将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列入开展全国难民救济的重要区域。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调整救济难民的机构。1938年4月,在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和1937年9月成立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隶属行政院的赈济委员会,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救济难民的最高领导机构。赈济委员会成立后,它主要分三个系统对难民进行救济:即各省市赈济会、各救济区和各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其中各省市赈济会是赈济委员会的下属常设机构,而救济区则是为了弥补各省市赈济会力量不足而成立的跨省区的临时机构。1938年5月,国民政府首先成立了6个救济区,后又设立34个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其中包括贵阳运送配置难民总站。<sup>②</sup>

另一方面,制定难民转移的具体方案。1938年7月,国民政府“通令湘鄂陕黔甘各省府在……汉中至天水各公路与湘黔公路沿途筹设难民临时寄宿舍。每隔三十里设一小站,五六十里设一大站,并备办宿具与饮食。凡难民经过,有护照者,准予宿食。其经费则由各该省与中央共同分担,飭令从速负责办理。并在陕南、陇南与湘西、鄂西、黔东等处设计难民收容生产计划,切实办理并代电行政院知照在案。兹现规定疏散办法如下:长江以北各地难民,在陕南一带收容,以汉中为集散地点;长江以南各地难民,在贵州各县收容,以贵阳为集散地点。其留滞武汉者,并应迅分二路疏散:一循鄂北公路至汉中;一沿武长公路或经沙市沿洛韶干线转赴湘西至贵阳。如交通工具缺乏,即督飭步行,并由各省政府督飭沿途各县对于经过难民之食宿、茶水、安全等项切实供给与保护。至省与省间遣送难民之联系办法,应由该会负责设计商同各该省政府实施”。<sup>③</sup>

从国民政府所制定的难民转移方案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长江以南各地难民应集中在贵州各县收容。如此一来,局势的发展自然将贵州推向了难民救济的前沿。贵州在难民救济中的战略地位从而得以凸显。

①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辑之《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2)》,台北: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3年版,第9—10页。

②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辑之《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2)》,台北: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3年版,第442—449页。

③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名称: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以下引自该处资料不再加注全宗名称),全宗号M26,案卷号70

## 二 贵州省政府对难民问题的因应举措

面对大量难民的涌入,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贵州省政府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因应举措:

首先,在拟定 1939 年度行政工作计划时,明确将难民救济工作列入其中,并拟定收容、疏散、安置三项计划。具体措施是:

在难民收容的问题上,“指定铜仁、玉屏、青溪、三穗、镇远、施秉、黄平、天柱八县收容由湘入黔之难民;独山、都匀两县收容由桂入黔之难民;清镇、平坝两县收容业经直接到达省会之难民”。<sup>①</sup>

在难民疏散环节上,规定:“各县收容之难民逾量时,分别疏散至锦屏、江口、省溪、印江、思南、石阡、德江、沿河、松桃、岑巩、炉山、平越、瓮安、余庆、湄潭、凤冈、绥阳、黎平、剑河、台拱、永从、麻江、荔波、平舟、三合、八寨、丹江、榕江、大塘、罗甸、安顺、镇宁、织金、黔西、大定等县。”<sup>②</sup>

在难民的安置问题上,规定:“难民中之工农分子,拟编插于各保,使作雇工雇农。如有学识及技术上专长者,则分别介绍于相当机关团体服务。其余孤单、老弱、妇孺,则分交各保寄养。并在各县选定适当荒地,设立农场,将难民中之有耕作能力者送往开垦。现已觅得平坝县属乾溪地方附近荒地一段,适合农场之用,拟先就此处着手办理。”<sup>③</sup>

其次,成立相关的难民救济机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难民数量的激增,难民救济事务的繁重,贵州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安排,先后成立了各种难民救济机构,以负责办理本省难民救济事务。其难民救济机构的演变过程如下:

### (一)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州分会的成立与裁撤

在贵州省赈济会改组成立之前,贵州省的难民救济工作最先是由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州分会专门负责办理。该会成立于 1937 年 10 月。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办法大纲》要求“于省及院辖市设立分会,于各县市设立支会”。<sup>④</sup>其目的在于办理各地方的难民救济事宜。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贵州省于同年 10 月成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州省分会,负责办理全省非常时期救济难民事务。分会主任委员由省民政厅厅长孙希文兼任。该分会设委员 11 人,由民政厅厅长、保安处处长、省会警察局局长、省救济院院长、华洋义赈分会副会长、红十字会会长及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秘书处、省赈务会各派职员一人担任。委员会内分设第一、二、三、四股,分别掌理难民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配置等事项。1938 年 1 月,该分会裁撤。

### (二)贵州救济难民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1938 年 7 月,贵州省又成立贵州救济难民委员会,负责办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事务。委员会主任按其组织规程规定由省民政厅厅长兼任,副主任由省财政厅厅长兼任。1939 年 4 月省赈济会成立后即被撤销。

### (三)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的成立与撤销

1938 年 10 月,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成立,隶属于贵州省难民救济委员会。后来,1939 年 5

①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 案卷号 58。

②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 案卷号 58。

③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 案卷号 58。

④ 《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办法大纲》,资料据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262。

月,贵州省赈济会改组成立后,撤销贵州省救济难民委员会,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归省赈济会统管直至1941年3月,该事务处才被撤销。

#### (四)贵州省赈济会的成立与撤销

贵州省赈济会在改组贵州省赈务会的基础上于1939年4月成立。该会成立的宗旨在于:办理赈济事宜。该会共设五组:总务组、财务组、筹募组、救济组、查核组。其中,救济组承担的事务包括:计划施赈、调查灾况、查放急赈、赈品采购运输、筹办农赈工赈、管理灾赈、救济灾难机关及团体之指导监督以及其他救济事项。从其组织机构与办事规程来看,基本上沿袭了原贵州省赈务会所承办的相关事务。虽然没有专门提及难民救济的问题,但其负有对救济灾难机关及团体之指导监督的义务。1943年2月,贵州省赈济会的工作业务被贵州省社会处所接管后,原贵州省赈济会亦随之解体。

除了贵州本省所设置的难民救济机构外,国民党中央驻黔救济难民的机构是: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贵阳总站。该总站成立于1938年11月1日。其职掌是难民食宿管理、难民治疗、防疫救护、药品征集与配发、难民保护、难民技术登记与职业介绍、难民统计及其他有关难民运送配置事项。该总站与贵州省赈济会所属的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在开展救济难民的具体事务中均有很好的合作关系。1941年2月,该总站撤销以后,其业务同样移交贵州省赈济委员会办理。

从上面贵州省难民救济机构的成立与演变的情况来看,不管其机构如何变化,最终完全承担贵州省难民救济工作的机构依然是贵州省赈济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贵州省政府在抗战时期虽然成立了各类不同的难民救济领导机构,但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机构当属贵州省赈济会。

### 三 贵州省赈济会难民救济活动基本概况

难民救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开展的一项十分繁琐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解决难民的吃住问题,还要解决其工作问题。不仅要培训其工作技能问题,还应考虑其思想认识问题,心理承受方面的问题。对于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我们不仅要了解其救济的目的、救济的组织机构、救济的经费来源,同时也应了解其难民救济的主要措施。

#### (一)难民救济的目的

关于难民救济的目的,国民党在1938年4月1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救济难民的目的在于:“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sup>①</sup>加强抗战力量,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实施难民救济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所言:“多救济一个难民,即为民族多充实一分力量;能减少敌人蹂躏一分同胞,即为建国多保持一分元气。”<sup>②</sup>

将难民救济与抗战事业联系起来,说明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国民政府已经不再把难民问题视为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将其视为能否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政治问题。<sup>③</sup>这是贵州省赈济会在开展难民救济活动时所应遵循的根本的政治目的。当然,除应服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政治目的之外,解决难民食宿问题同样是贵州省赈济会难民救济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基本目的所在。此两重目的具有

①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页。

② 转引自孙彦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第106页。

③ 参见蔡勤禹:《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146页。

不可分性。其中,解决难民食宿问题是保存抗战力量的基础与前提,而保存抗战力量则是解决难民食宿问题的最终目的所在。

## (二)难民救济活动的组织保障

抗战期间,贵州省赈济会作为领导贵州全省救济难民事务处及各县分处工作的组织机构,为贵州全省难民救济事务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组织保障。其组织领导作用可从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就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而言,“本处职员以调派各厅处职员兼充为原则,但有必要情形得由处长遴员呈请贵州省赈济会委派专任”。遇有紧急文件时,得“签请省政府核示遵办并分报贵州省赈济会”。另一方面,就各县救济难民事务分处而言,“各县分处请领办公费应于每月五日以前造具支付预算书二份,连同请款凭单呈请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转请贵州省赈济会核发,并须于下月五日以前造具支出计算书二份连同单据粘存簿一并呈送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核转贵州省赈济会查核”。<sup>①</sup>

## (三)难民救济活动的经费来源

贵州省赈济会开展难民救济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

一是中央赈济委员会拨款。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为了筹集赈济难民款项,特公布《民国27年赈济公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共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一条指出,发行赈济公债的目的在于“赈济难民,扩充生产事业”。公债发行的总额为1亿元,分期发行。<sup>②</sup>国民政府公债的发放,在积累基金的同时,可为地方提供必要的赈济费用。譬如:1938年9月,中央赈济委员会曾拨给贵州难民救济款10万元。<sup>③</sup>又如:贵州省赈济会鉴于本会难民救济经费匮乏,特于1940年年初向重庆中央赈济委员会拍发电报,请求再次划拨10万元的救济经费。电文指出:“重庆赈济委员会钧鉴:黔与战区拉近,办理难民救济事宜。前于二十七年(1938年,笔者注)九月曾报蒙钧会拨发十万元,并由本省自筹十万元,妥慎安插,具报在案。现在难民日增,上款行将用罄,本省财力贫乏,筹措困难,拟请续发十万元,以资救济而惠及灾黎。临电迫切,祈赐覆为禱!”<sup>④</sup>再如:我们从1942年贵州省赈济会呈报给中央赈济委员会关于1941年度所用中央赈济款项表中可知,1941年贵州省赈济会从1月至12月间,获得中央赈济委员会所划拨的经费数额具体为:1月,972.00元;2月,4210.00元;3月,无;4月,9122.90元;5月,7482.80元;6月,20792.00元;7月,4448.40元;8月,无;9月,1596.00元;10月,1156.00元;11月,396.00元;12月,920.00元。本年度贵州省赈济会从中央赈济委员会所获经费共计为51096.10元。<sup>⑤</sup>中央赈济委员会的拨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州省赈济会救济费用严重不足的缺陷。

二是本省政府拨付的救济难民准备金。据《贵州省赈济会组织规程》规定,本会经费由省政府直接核发,不得在赈款内开支,以确保赈款专款专用,防止挪用赈款现象的发生。<sup>⑥</sup>譬如:1939年冬,平舟县在受领救济难民准备金之后,在经费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经费大有节余,为此,该县政府受命将节余救济难民准备金缴回贵州省金库。对于此一情形,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曾专文向省

① 《修正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组织规程及各县分处组织规程》,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6 案卷号 24

② 《民国27年赈济公债条例》(民国27年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参见《中华民国法规辑要》第3册之《财政》部分,重庆:中央训练团编印1941年版,第456—457页。

③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 案卷号 389。

④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 案卷号 931。

⑤ 数据资料均据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 案卷号 1027。

⑥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 案卷号 290。

赈济会报告。报告称：“案查本处（指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笔者注）前因配置由桂入黔难民，曾发给平舟县政府准备金二千元，令饬具领备用。近以该路入境难民为数不多，该县一时尚配置不到，因饬将上项准备金缴回，以重专款，兹据呈报。”当时该县在经费的开销上，仅花费50元用作修理难民住所，尚余1950元。所余款额全数解缴“贵州省金库”。<sup>①</sup>由此可见，省救济难民准备金在使用的过程中侧重于专款专用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防止救济难民经费在使用过程中无谓的浪费与开支。

三是由社会各界所捐赠的款项。此一项亦成为贵州省赈济会赈务经费的重要来源。譬如：1939年2月4日，日军轰炸贵阳城区的事件发生后，贵阳的灾情获得全国各地同胞的关注。其中，成都贵州旅蓉同乡会一次性向贵州省赈济会捐款1500元法币用于此次空袭救济。<sup>②</sup>

#### （四）难民救济的主要措施

根据中央赈济委员会所制定颁布的有关规定，贵州省赈济会在开展难民救济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

##### 1. 办理难民登记。

难民进入到贵州境内后，首先必须办理难民登记手续。在贵阳难民总站和贵州救济难民事务处裁撤之前，由这两个机构负责办理。前者向中央赈济委员会呈报，后者向贵州省赈济委员会呈报。这两个机构裁撤后，则由各县赈济分会承担，要求按月向省赈济会呈报难民具体数字。其中，玉屏县为湖南入口县、独山为广西入口县、盘县为云南入口县、毕节、桐梓为四川入口县。难民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来自何地、健康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原来每月收支概数、现在经济状况、随行家庭总数、原任工作、运送情形、运送工具、收容年月日、配置地点、自行出所的原因与时间等。办理难民登记的目的在于，掌握难民基本情况，加强对难民的组织管理，防止冒充难民或所谓的不良人士混入，即所谓“防奸杜弊”<sup>③</sup>，以更好地开展对难民的施救工作。

2. 注重同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贵阳总站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首先是成立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贵阳总站与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联合办事处，并制订组织简则。同时规定：两机构在靠近湖南、广西两省的铜仁、玉屏、锦屏、独山等县设置联合办事处，其名称为：贵州省某地救济难民联合办事处，以便难民到达时办理运配一切事宜。涉及的内容包括：难民登记、编配、组织事项；难民之疾病防疫救治事项；难民临时食宿及其照料事项；难民咨询及其他委托事项；沿途车轿民船牲畜力资高抬价目、勒索酒资、欺压难民之取缔事项等。<sup>④</sup>这种中央与地方对难民进行联合施救的模式，有利于尽快缓解难民的痛苦，提高施救的时效性。

3. 组织难民服役。省难民救济事务处针对要求服役的难民可组织其服役。具体要求按照行政院颁布的《非常时期难民服役计划纲要》依从难民本人志愿为原则，但如认为必要时，得由政府统制支配之。难民服役为兵役与工役两种。其中，工役又分筑路（铁道公路及军用路）、治水、垦荒、军事工作（运输掩埋等）、自卫工程及其他适用难民诸事项。<sup>⑤</sup>

①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93Q。

②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92Q。

③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2Q。

④ 参见《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总站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联合办事处组织简则》，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案卷号 28。

⑤ 参见《非常时期难民服役计划纲要》（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行政院通过），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辑之《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1）》，台北：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3年版，第460页。

4. 实施收容难民日报制和发放难民给养逐日登记汇报制。要求各县救济难民事务分处按日将收容难民情况和逐日发放难民给养情况如实向省赈济会呈报。其中,难民按日领取给养时必须盖章或捺指印,以示领取凭证。

5. 建立难民农场与难民工厂。譬如:《独山县筹设农场工厂配置难民初步计划草案》中就规定:“本县为救济难民,使其各有职业从事生产起见,拟筹设农场工厂配置之。”<sup>①</sup>其中,农场经营的事务包括:荒山荒地之开垦;已荒田土之耕作整理;各种农作物之栽培;一般农业上需用之籽种及器具之供给;各种林木之栽培;农产物之制造;副业之经营;农产物及其制品之运输分配及销售。工厂经营之事务包括:染织、造纸、斗笠、制革等。通过难民农场与难民工厂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安置难民,让难民有事可做;另一方面,可以创造产值,既增加难民的收入,也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再如:青溪难民工厂。该厂于1939年秋,为配置难民而组成青溪难民工业互助社。1940年秋因各户资本亏蚀净尽,经中央赈济委员会批准,组织合作社,向县金库借贷维持各户生活。后又改为教场坝织布生产合作社。1941年元月,因地址狭小,乃将工厂迁移到东门外两湖馆,易名为青浪镇东门街织布产销社。<sup>②</sup>

6. 规范难民救济费的发放。难民救济费的发放依据中央规定的标准统一发放。发放的对象必须是现住原地而按月领取生活补助费者的法定领款人。对于已经死亡者、冒名顶替者、没有固定工作而迁徙他处者,则予以停发。发放赈款时,除各县点放委员、临场办理员必须到场外,还可邀请地方熟悉难民情形者及难民领袖到场参观。一旦发现不符难民资格者,当场停发其难民补助费。<sup>③</sup>

7. 实施难民组训。难民组训,是国民政府中央的既定政策。贵州省赈济会根据中央的要求,于1942年制定颁布了《贵州省赈济会组训难民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其目的在于“组织训练本省难民”。为此,特设立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配置难民各县则设立难民组训办事处,办理各该地居留难民之组训事宜。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由省赈济会、省党部、省政府民政厅、省政府教育厅、绥靖公署、全省保安司令政治部或特党部、市政府共同组织。《大纲》规定:“凡新入境之难民,一经配置后,即由省赈济会通知组训委员会,并饬新难民至组训会报到,组训会即分别予以编入小组。”每难民小组人数,由7人起至15人止。譬如:贵阳的情况,由于难民在全省最多,因此,依据难民的职业分为:摊贩组(20组)、负贩组(10组)、制皮革组(20组)、擦皮鞋组(13组)、理发组(10组)、其他如店员厨师工友等组(15组)。难民训练以精神训练、知识训练和卫生训练三项为原则。《大纲》同时规定了各项训练的基本内容和教材。<sup>④</sup>此外还制定了《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组织规程》16条。<sup>⑤</sup>

8. 推广难民贷款。中央赈济委员会1939年10月颁布了《赈济委员会小本贷款规则》。该规则规定:申请小本贷款者,“应由当地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或保甲长或殷实商店或有正当职业之邻居二人以上”为之证明。“但申请贷款超过一百元时,必须取得当地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之证明”。该规则根据不同经营,规定了所贷金额:甲、以负贩为业者十元至二十元;乙、摆摊或开

① 资料据贵州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M 26,案卷号37。

② 《镇远县难民工厂调查表》(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M 24,案卷号754。

③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M 24,案卷号754。

④ 《贵州省赈济会组训难民计划大纲》,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M 24,案卷号752。

⑤ 《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组织规程》,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M 24,案卷号752。

设小商店者十元至一百元；丙、经营小工艺者三十元至五百元。<sup>①</sup>

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针对难民小本贸易或手工业制定了《贵州省救济难民贷款办法》。该办法规定：“凡经本处所属各县分处登记收容之难民年满二十岁以上因经营小本贸易或手工业，不分男女，均得向各该收容之分处申请贷款。”难民最高可以贷 20元，携有家属者，每位家属一人可以多贷 5元。难民贷款免取利息。同时规定，难民所贷款项必须在一年之内还清。如需要延期偿还者得各该县分处声明理由。<sup>②</sup>从贵州各县难民小本贷款的情况来看，难民年龄 20到 55岁不等。难民主要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其中以湖南省难民居多。<sup>③</sup>出现这种情况，应以湖南与贵州相邻有很大关系。

1942年，省赈济会根据物价上涨的情况，确定略为增加小本贷款额。同时，择定交通便利之大县，如遵义、桐梓、安顺、毕节、镇远、铜仁、独山、榕江等县，设置小本贷款所，责成该县政府会同县赈济会兼办借贷，以此节省人力，推广小本贷款。

9. 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1941年中央赈济委员会明确要求，凡已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者，应充实其机构，加强其工作；其未成立者，应于文到一月内成立，并将成立情形具报。同时要求，每月每所介绍人数不得低于所在地难民总数百分之五。以此作为工作竞赛的成绩之一。根据中央的要求，贵州省赈济会在 1942年的行政工作计划中明确将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列为其本年度的工作计划之中。计划指出：“难民职业介绍所，在三十年度时，本会亦曾办理，惟未专设部门，成效甚少。而职业介绍，又属积极救济之一，不容忽视。本年拟由总务、救济两组，指定人员负责登记、调查、考核，暨与各机关团体接洽介绍，同时并责成难民入口县区之独山、盘县、镇远、毕节等县赈济会遵照办理，按月呈报。”<sup>④</sup>

10. 办理难民贫民之免费治疗。根据贵州省赈济会三十一年度行政计划纲要的要求，由于药价奇昂，一般患病之难民贫民，实无力医治。“本年度拟由会同各卫生机关、各医院、各国药号，切实接洽，商订办法，凡患病之难民贫民，经本会证明者，请予免费诊治，至各县赈济会，亦须同时遵办此项业务，以宏救济。如遇特殊特疫，由会报请钧会核办”。<sup>⑤</sup>

由上可见，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不仅目的明确，机构健全，经费来源多样化，而且还采取了多种切实可行的救济措施。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本省的难民救济工作。

## 四 贵州省赈济会难民救济活动所取得的成效

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大量难民涌入贵州。在此情况下，贵州省赈济会同国民政府中央驻黔难民运送配置机构及本省其他难民救济机构协调配合，勇挑重担，承担起全省的难民救济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贵州省救济过境难民超过 10万。其中，仅 1938年 4至 9月通过公路系统接运后撤伤兵即超过 1万余人。同时，还运送千余孤儿至昆明。对于当时贵州省难民救济的情况，我们可通过以下具体数字说明之。

① 《赈济委员会小本贷款规则》(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 案卷号 13。

② 《贵州省救济难民贷款办法》，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 案卷号 4。

③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 案卷号 13。

④ 《贵州省赈济会三十一年度行政计划纲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 案卷号 757。

⑤ 《贵州省赈济会三十一年度行政计划纲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 案卷号 757。

表 1 战时救济过境难民表<sup>①</sup>

年 别	共计		给养救济者		疏散运送者		介绍工作者 (人)
	人数	金额(元)	人数	金额(元)	人数	金额(元)	
二十六年	74	370	43	215	31	155	.....
二十七年	68	408	36	216	32	192	.....
二十八年	104	4320	78	4112	26	208	.....
二十九年	3000	7800	384	1152	2216	6648	400
三十年	1327	1734	436	1389	115	345	749
三十一年	1107	75835	1084	75776	23	.....	.....
三十二年	623	15,780	623	15,780	.....	.....	.....
三十三年	110530	149557447	27683	84347842	81061	65209605	1786
三十四年	5970	2115000	5726	305000	244	1810000	1810000

资料来源:根据本省社会处造送资料编制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贵州战时救济过境难民最多的年份分别是 1940年和 1944年。其中,尤其是 1944年,救济过境贵州人数超过 10万人,给养救济经费超过 8000万元。就贵州省赈济会而言,其组织虽然成立于 1939年,当时在贵阳开展难民救济活动的组织,除贵州省赈济会直管的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以外,还包括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难民贵阳总站。两大难民救济机构之间曾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就 1939年、1940年、1941年这三年来说,救济过境贵州的难民总人数为 4431人;支出经费为 13854元。给养救济者难民人数为 898人,支出经费为 7551元。疏散运送者 2357人,支出经费为 7201元。三项经费总计支出 28606元。

表 2 战后贵阳市难民疏散数量(1946年 4月至 12月)<sup>②</sup>

疏散终点	人数	车辆
总计	14940	470
长沙	12909	401
衡阳	486	16
柳州	148	5
梧州	44	1
贵县	422	15
广州	170	7
缅甸	442	15
马来亚等地	419	10

资料来源:根据善后救济总署贵阳难民疏散站造送资料编制

① 资料据《贵州档案史料》1987年第 2期,第 113页。

② 资料据《贵州档案史料》1987年第 2期,第 116页。

上表表明,战后贵阳市疏散难民 14940人,动用车辆 470辆,此一数字还不包括贵州其他地区本省难民疏散人数在内。在疏散的难民中,以湖南人为最多。同时还涉及到海外难民 861人。

表 3 战后贵阳市难民疏散费用(津贴实放额 1946年 4月至 12月)表<sup>①</sup> (单位:元)

疏散终点	共计	伙食津贴	车费津贴
总计	516450242	45248000	471202242
长沙	470120600	41400000	428720600
衡阳	16230912	1540000	14690912
柳州	4082580	328500	3754080
梧州	2481925	197500	2284425
贵县	10150605	888000	9262605
广州	13383620	894000	12489620

材料来源:根据善后救济总署贵阳难民疏散站造送资料编制。

说明:元以下数未列。

上表表明,贵阳市难民疏散所耗费的经费包括难民伙食津贴和车费津贴在内,两者相加,共花去 5亿 1千多万元。

除上面所提及的贵阳市在抗战结束后外省难民疏散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有本省待疏散难民 42008人,涉及到全省 12个地区,共需预算经费近 30亿元。

以上所提省内外难民疏散的情况反映出,在抗战期间滞留在贵州尤其是在贵阳的难民基本情况。对于当时到底有多少难民滞留在贵州,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具体的数字。譬如:我们就以当时滞留在贵州省三穗县难民概况为例:三穗县位于贵州的东部,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东北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毗邻,是湖南进入贵州的重要通道,为黔东交通枢纽。从 1938年起,几乎每天都有人数多少不等的难民涌来。局势紧张时,如“长沙大火”,桂林、柳州失陷之后,每天入境难民有 200余人。难民在三穗滞留定居的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由镇远方向往贵阳流去。据档案记载,停留在三穗城关地区的难民人数:1939年 925人,1940年 1870人,1941年 2128人,1942年 1358人,1943年 684人,1944年 933人,1945年 1087人。抗战期间,由于难民、伤兵和驻军云集,使三穗人口激增。1937年为 60869人,1941年增加到 69317人,4年间增加 8450人。这还未包括该县大量征兵外出的数字,再加上当时流落到乡间的难民及短期驻军无法统计者,实有人口当超过 72000人。<sup>②</sup> 三穗县的难民概况说明,滞留在贵州的难民具有不确定性。有的年份偏多,有的年份偏少。这一状况的出现,自然增加了我们统计难民数量的难度。但不管怎么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贵州,势必增加贵州人口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同时也增加贵州省赈济会等难民救济机关工作的负担。但是,大量难民的涌入,既是压力,同时也是动力。从某种程度来说,难民的涌入,特别是难民中高层次人才的到来,给贵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大量难民之所以能在贵州相对稳定地生产与生活,包括贵州省赈济会在内的难民救济机构所开展的系列救济活动,功不可灭!

<sup>①</sup> 资料据《贵州档案史料》1987年第 2期,第 118页。

<sup>②</sup> 龙荣森:《抗战时期沦陷区难民在三穗》,《贵州档案史料》2000年第 5期,第 70页。

## 五 对贵州省赈济会开展难民救济活动的评价

吴捷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中对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从客观上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该文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下，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难民救济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认识到了其在抗战中的所属重要地位，对难民采取一系列的衣食住行、工作和教育等救济与安置措施还是极为有效的。尽管这些救济与安置很不完善，行动上也拖沓；但客观上还是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后方，支援了抗战的，较为积极地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使中国不至于沦陷，实在是功不可没。”<sup>①</sup>那么，对于贵州省赈济会而言，其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是贵州境内各种难民救济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官方开展难民救济的重要机构。前面已经提及，贵州是国民政府实施难民救济的重要场所之一。因此，贵州省赈济会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相较于其他机构而言，其贡献亦不容忽视。综其所从事的救助活动，不论是对贵州，亦或对全国，均有积极影响。具体来讲，可从两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配合了中央政府对难民救济工作的整体要求。1937年全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在统一设置全国难民救济机构的同时，明确要求将贵州作为西南地区难民转移的重要基地，在贵阳设置难民转运总站。在此背景之下，贵州省赈济会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政府对难民救济工作的整体要求。

其次，贵州省赈济会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无论是对难民、对贵州本省、亦或对整个国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对难民而言，它为难民们创造了必要的生存条件，增强了难民们的生存能力。譬如：难民通过小额贷款，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增加生存的活力。难民通过参加难民工厂或农业垦殖，既创造一定的产值，亦获得一定的酬金，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

对贵州本省来讲，难民们在贵州所从事的生产、生活与文化教育活动，给落后的贵州地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此间，特别是大量高校内迁贵州，一些科学家、教育家来到贵州，这无疑为贵州在战时的发展创造了极其宝贵的人文社会资源。当时，先后迁入贵州的高等院校主要有：唐山工程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在这些内迁贵州的高校中，浙江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广西大学在（贵州）榕江期间，经常开展文化、体育活动，除每星期举行一次各种球类比赛外，还开运动会，演话剧，举办音乐会及画展。农学院曾帮助县农推所，成功地培育、试种了若干个品种的良种番茄”。<sup>②</sup>大夏大学内迁贵阳后，由于副校长欧元怀兼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因此，贵州省的中小学校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几乎都是大夏的校友。又因大夏大学训导长傅启学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贵州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也几乎全是“大夏的校友”。总之，“大夏大学内迁后，对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是大的”。<sup>③</sup>又如：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南迁贵州平越（今福泉县）期间，“不仅给山城（指平越县）带来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山城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还积极支持了

① 吴捷：《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第28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③ 同上书，第141—142页。

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sup>①</sup>而湘雅医学院内迁贵阳后,对带动贵阳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则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该校拥有14名教授、5名副教授以及20余名讲师和助教。院长张孝骞不辞劳苦,坚持步行30里到花溪给地方卫校讲课。<sup>②</sup>

对于高校内迁所产生的影响,胡瑛在《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及其意义》一文中作出了深刻总结。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区高校大内迁,保存了我国科技文化精华、高等教育之国脉,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分布不合理的格局。内迁高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坚持抗战,弘扬民主,发展学术,造福地方做出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有效地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不至于因为战争而中断。他们将先进的思想、技术、文化带给了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堪称民族危亡关头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在极宏阔的时间、空间上的成功大转移和大传承。”<sup>③</sup>

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说,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开展各类难民救济活动,对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缓和各类矛盾、保存抗战力量、增强民众抗战的信心等方面,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救济难民的同时,对贵州本省的发展亦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和平已成为社会发展主流的情势下,我们依然应肯定贵州省赈济会在难民救济活动中的历史作用。贵州赈济会为开展难民救济工作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可为和平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作者周术槐:贵阳学院政教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183—184页。

③ 胡瑛:《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及其意义》,《文史杂志》2005年第4期,第15—16页。